

三等奖

极权主义中国之批判

陶业

不论风云如何变幻，政治反对派行动起来，全体中国人行动起来，积极地，全面地解构极权主义制度！解构！解构！解构！

毛泽东一直有个梦，在中国建成一个极权帝国；习近平圆了这个梦，并把极权帝国推进到成熟形态，这意味着帝国将迅速进入极权社会的晚期。正如一个桃子，熟了，接着就开始腐烂。

在六四屠杀之后，极权主义发生松动，邓小平曾经开启对威权主义的试探，江泽民和胡锦涛任内也都曾经尝试着弱化意识形态，开放社会空间，探索市场经济，但是后极权主义好景不长，当习近平上位后，便立即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那就是大开倒车，重返极权主义。习近平花了十多年时间，建起了一个极权帝国，并迅速进入癌症晚期。

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以“反犹主义”为旗帜，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欧洲。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旗帜，建立起了共产主义阵营。毛泽东的中华帝国，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自以为是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向着亚、非、拉输出革命。三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向着全世界开疆扩土。意识形态武器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这些是极权帝国区别与其他类型帝国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作为上述极权帝国的忠实继承者，其野心在于构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覆盖世界广袤的疆

域。习近平的野心正在向着这个极权帝国的目标奋力逼近。

为了解构和铲除极权主义，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这个极权帝国究竟都有那些特征。

极权主义中国的制度性特征

极权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反文明、反文化、反人道、反人权和反人性的制度。以警察国家为组织系统建立恐怖统治，以意识形态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以高科技为手段全面控制社会生活。

反文明

文明的发展通常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发展相关；但是，极权帝国则与文明发展完全背道而驰，拒绝文明，践踏文明，与文明发展逆向行驶。极权主义的存在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和威胁。

文明的发展具有趋同性，即落后的总是向着先进发展，愚昧的总是向着智慧发展，野蛮总是向着文明发展，封闭的最终都是要开放的。文明的落后并不可怕，先进文明总是在向落后文明分享它的成果，比如分享蒸汽机、电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比如分享民主、法治、人道、人权的概念；令落后文明逐步赶上先进文明成为可能。况且，落后的文明有着追赶先进文明的内在冲动。

可怕的不是文明的落后，而是文明的倒退、堕落和野蛮。极权主义把人动物化，把统治暴力化，把思想愚昧化，把社会封闭化，而这些正是习近平时代极权帝国的文明特征：回归野蛮。

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逆向行进，中国作为一个野蛮的政治实体对世界文明进行挑衅和诋毁，并试图取代。野蛮与文明的对立，这一现象无法归入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习近平治下的文明堕落是全方位的，断崖式的。中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全方位地腐蚀着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这种挑衅正在给世界带来灾难。

反政治文明

什么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政治文明由宪法定义公权力在国家事物和公共事物中的权限和边界；政治文明确保所有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政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公民有无言论自由、有无信仰自由、有无新闻自由、有无结社自由、有无组党自由。在中国，这些都没有。

习近平高调提出他自定义的民主的标准：“全过程民主”。那副架势是要在全世界抢占价值制高点和重新定义“何为民主”的话语权。正是他提出了“全过程”这个概念，恰恰道出了极权主义的权力实质。中国的现状恰恰是“实现了全过程专制”。

正是这种“全过程的社会主义专制”陷中国于黑暗。“全过程专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当专制是“全过程”的时候，它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比如上海清零的全过程就是对个体实施控制、奴役和征服的经典，一个极权主义的典范。

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一。究竟是民主制，还是极权制；是分权制，还是集权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性质。民主制度通过公民选举和政党竞争机制实现对公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政治文明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不断丰富政治哲学的现代内涵。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正是在持续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

极权主义道路是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极权中国的国家制度是暴力革命和腐败政治的产物，它是一个野蛮的制度。一个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无论是早期针对“人”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晚期针对“人”的极权恐怖统治，都体现着反文明的政治特征。

极权帝国的制度扫清了权力膨胀的障碍，导致权力毫无边界；极权帝国的权力为野蛮腐朽的制度护航，任凭其在文明的航道逆向行驶。

文明的政治制度驯化权力，野蛮的政治制度改造人。

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二。政治文明的要义在于建立和实行一套由公民选举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公民的政治地位，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公民是否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定着公民是否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文明以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隐私为己任，捍卫公民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公民为上，社稷次之。

中共在剥夺人民选举权的同时拒绝了权力来源的政治合法性和代表性，因而丧失了权力正当性。它造成两个恶劣结果，一方面是中共权力的无比专横与傲慢，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政治地位极其卑微。人民没有公民权，人民不能讨论政治，更不可能游行示威，挑战权力。当人民缺席政治的时候，必然导致独裁横行，寡头专断，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民主被践踏和政治文明的堕落。

文明政治由公民运作，野蛮政治由寡头运作。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三。宪政以制约公权力和捍卫公民权利为要义。宪法定义公权力在国家事物和公共事物中的权限和边界以及权力的分配与制衡，从而限制政府权力。公权力的权限和边界决定着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宪法同时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保护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保护公民参政议政不受迫害的权利。文明的政治是为众人谋尊严、谋自由、谋福利的政治。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是政治文明的普世内涵；努力实现这些内涵，捍卫这些内涵不被篡改，是宪政的使命。

中国的宪法是极权主义的产物。中国的宪法规定了中共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规定了国家主席没有任期制。因此一党专制和寡头政治是宪法所固定下来的。由于没有反对党的存在，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监督，没有轮换；决策没有民主，没有程序，没有规范；权力根本不代表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由于无法遏制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和滥用，权力更为骄横，制度更为僵化，秩序更为败落。权力私有化，

权力黑化，政治走向黑暗和野蛮是必然的。这标志着中共治下无政治文明可言。

蒋经国宣布开放党禁、报禁，向着政治文明迈进；习近平宣布取消任期制，灭杀政治反对派，向着野蛮倒退。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四。法治体系的建立在于维护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秩序，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法治，作为政治理念，强调法律至上，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没有法治，社会将处于动乱中，政治也就无文明可言。

在中国，习大于党，党大于法，司法按照党的意志运行，按照领袖个人的意志运行。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公民被关进了笼子。中国没有真正的法治，个人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司法黑暗，司法腐败，司法堕落为政治工具。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法治向权力倾斜，有权有势者，受益受庇护；无权无势者，受虐受冤屈。

法治是文明政治的治国理念，人治是野蛮政治的常态。

公共政策与治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五。政治归根结底是服务大众的，通过一系列利民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进步与繁荣。政治文明体现于公共政策与治理的执行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无序的，非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极权中国在清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治理能力，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展现的公共政策制定水平，说明他们真的很无能。

文明政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老百姓的，野蛮政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极权统治的。

军队国家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六。军队服务于国家和国民，坚守政治中立。既不是听命于某一个政党或团体，也不属于某个寡头所私有；既不是用来对内干涉政治，也不是用来对外开疆扩土的。极权中国的军队听从党指挥，成为极权制度和习近平个人的暴力

工具，成为习近平的御林军、私家军。由此，军队的高层堕落为特权阶层，这支军队的腐败，足以与晚清八旗子弟的无能浑噩媲美。近闻，地方武装部重新成立，镇压老百姓又有新动向。

极权主义的整体意义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不同点在于威权主义仅仅发生在国家政权的顶层，它是由君主或元首个人在国家层面实施独裁的国家治理形式，而极权主义已经不仅仅是顶层意义，而是整体意义，权力的独裁和霸政不仅仅发生在国家政权的顶层，而且发生在权力的所有层面，从顶层直至基层。将国家中央极权的模式逐级向下级权力机构延伸，既在政权的广度上，也在政权的深度上，对省、市、地、县、乡（区）、村（街道）的权力施行全面垄断。一个省份就是一个专制王国，一个县就是一个专制王国，甚至一个村落一个乡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王国，党支部就建立在村上，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就是这个村里的专制魔王，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全国性自上而下的从中央直达乡村的全面专制社会。一个“全过程专制”的社会就是一个完整的极权主义社会。

国家法律体系整体性失效，因为权力威严在司法威严之上。一方面公权力粗暴干预司法，令司法失去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无力遏制公权力膨胀。司法不仅对遏制顶层权力无效，而且对遏制底层权力也无效，因为不论在权力的哪一层面，党都大于法，最终裁决权在党，不在法。司法的失效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的。在极权制度下，司法权和立法权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沦为习近平打压反对派的工具。

极权中国的权力特征

权力极权化（totalitarianism）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权力以恐怖为手段实行意识形态统治，并对社会生活从思想、行为到私人生活进行绝

对的全面深入的控制。与威权统治不同，极权统治不仅是表面的、宏观的，而且是全局性的，从宏观一直到微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

极权国家与威权国家的权力特点之区别在于：威权国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反对派，存在有限的选举，虽然权力的更替几乎不可能；但极权主义之下，权力绝对集中掌握在唯一的政党手中，政治反对派和其他反对势力没有生存的空间，践踏民主无需遮羞布。与纳粹组织不同的特点在于纳粹是精英组织，而中共党的组织则是由逆向淘汰出来的人渣组成，党的各级组织都烂透了。

权力定于一尊，即独裁。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共同点在于：统治者按照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实行统治，独揽国家政权，并掌握国家镇压机器，以对人民形成威慑。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在权力的授予、权力的使用、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监督等方面与民主体制水火不容。不同之处在于：威权主义要求所有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而极权主义则是为了一个人的意志可以牺牲所有人的利益和人性，甚至牺牲人本身。威权独裁者身边尚有一批思想敏锐操作力强的谋士和助手，但极权独裁者习近平的身边，都是戚戚小人，太监，犬儒和谄媚者，都是些无能平庸之辈。

习近平的权力非正当授予，却凌驾于司法之上，凌驾于宪法之上，违背了执政的最低道德和伦理，却无力将其置换。美国和德国领导人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真是名至实归。

权力黑化，当权力将法制清零，人权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义清零之时，我们将这样的权力状态称之“权力黑化”。绝对权力绝对黑化。权力黑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国家处于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状态。

习近平近臣蔡奇在北京清理和驱逐低端人口的政府行为是典型的黑社会行为模式；习近平近臣李强在上海“清零”过程中，置市民于生死边缘，在封城中将黑社会的手法使用得淋漓尽致。这些政府行

为狠毒、决绝、无耻、卑劣、毫无人性、逼人致命、警匪一家、如同黑社会。

黑社会权力化，当黑社会成了“第二政府”，说明黑社会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并具有一定的政府功能。黑社会原本就劣迹斑斑，一旦掌握了政府基层权力，则更是嚣张。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挟国家公器而行黑道。黑社会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了政府行为中，不仅仅是官员被贿赂和收买，也不仅仅是它在政府的羽翼庇护下犯罪，而是它本身就是政府犯罪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是黑社会企业化公司化，而且是政府权力代理人化、私人化。政府不仅仅为黑社会提供行业准入资格，市场准入资格，提供开发权和经营权，而且协助黑社会垄断资源和市场，欺压受众。黑社会政府化，为政府黑社会化构建了社会基础。

权力愚化，极权主义权力的愚化是必然的，缺乏知识的权力是愚昧的。这里的“知识”，并非指工具层面的技术，更多的是指对文明的认识，对人文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极权主义违背人类智慧的结晶，它的野蛮，决定了它的愚昧；它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出发点决定了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处于愚蠢的愚昧的荒诞的状态。

由于不存在监督和挑战，极权制度催生着愚蠢的、荒诞的、不计后果的决策，恶法和昏招时时都在发生，权力已经失去基本的政治判断力。在常态之下，权力就是昏庸，昏聩，失智，蒙昧的。

当极权主义全面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时候，它不再需要智慧的大脑，只需要一支国家暴力机器，能制造恐惧、能够镇压就行；又由于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诸如摄像头，脸部识别，手机定位，大数据的使用，从而使得社会控制趋于系统化、智能化、自动化，因此全面控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变得相对简单，它只对控制技术的水平有要求，对权力的能力和智慧没有太多要求，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晚期的统治者无论如何愚蠢都没太大的关系，社会控制系统将推动极权主义体制按照惯性滚动。

在极权主义初期，它需要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枭雄，文功武略；在极权主义中期，它需要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平庸之辈，花拳绣腿；在极权主义晚期，习近平之所以被看中，乃因其无德无才，胸无点墨。不难看出，极权主义从初期到晚期，中共领袖们的智商是递减的，愚蠢程度是递增的，以至于随便送个白痴蠢蛋上去都能运作。即便大众对领袖人物不满，也没有能力和权利去更换。权力在“皇帝新衣”的笼罩中沾沾自喜。

权力腐化，公权私用化，公器私用化，中共硬是把腐败培养成了一种官场文化，令腐败制度化、腐败群体化和腐败规模化。

权力特权化，特权的实质是特权阶层所有制。中共集团是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垄断利益集团。特权有两个内涵，一是特权的行使，二是特权的享受。

中国政治文明的堕落是全方位的，习近平以极权主义挑衅民主制度，以恐怖主义遏止人民参政，以党治挑衅法治，以共产党文化取代其他所有的文明。

反经济文明

什么是经济文明？经济文明体现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健康的资本运作，体现于所有制文明、商业文明和生产文明，体现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经济行为唯有尊重理性，遵循市场规律，追求效率，才符合经济文明。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大航海时代禁海和在大贸易时代禁商的愚昧，那么对极权中国在大数据时代禁网的非文明行为也就不足为怪。

计划经济一个健全而强大的市场经济，宽松的市场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自由而多元的市场经济平衡供需关系，调节商品价格；而计划经济由国家垄断，由国家所有制主导，以强制手段干扰经济活动，剥夺了经济活动的自由。政府控制市场，控制货币，控制楼市，控制股市，控制汇率。今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意见》，按照中央的意志，统一规则，统一要素，统一资源，统一商品，统一监管。强权政治之下，没有经济自由。供销社出笼了，大食堂开张了，计划经济回来了。以雄安作为计划经济的样板所体现的盲目性，构建着海市蜃楼，如今已是鬼城，阴森森，不见人气。表面上看，计划经济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实质上是对人类生活的控制，这是极权主义的内涵决定的。

仇视资本健康的资本运作激励生产发展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但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在本质上仇视私人资本，仇视资本家，仇视市场。中共在其本质驱使下，必然要打击资本，打击中小企业家。国家资本操纵着国家经济命脉，维持僵尸企业运作，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地方政府运筹的投资欺诈，中国式庞氏骗局的运行，造成巨大的资产泡沫，不仅血洗国内中产阶级，而且危及世界金融稳定。在金融欺诈，股票欺诈，投资欺诈中，都能看到权力操纵的影子。

张扬公有制所有制文明保护私有产权，抵制任何侵吞私有财产的企图。公有制的实质是权力所有制，是国家垄断。在公有制之下，权力垄断着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国企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强占土地和融资等经济活动中的优势环节，独吞经济优惠政策。极权主义还热衷于传播“共同富裕”的谎言，以“劫富济贫”，“财富均享”煽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以“公私合营”剥夺富人产权，令其破产；以“国进民退”，鲸吞私企，化私有为公有；扼杀中产阶级的成长环境，令其重新沦落回社会底层。

反商业文明健康的商业文明体现人与商品的关系，体现契约精神、体现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服从合理的税收制度。中国的私营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权力深度干预经济活动和企业活动，强制私企向国家和地方政府输送利益，沉重的税负绞杀经济活力。逼迫私企与权力勾结，寻找权力靠山。恒大暴雷，碧桂园暴雷，房地产泡沫隐含体制性金融危机。在经济活动中推崇党文化，向民营企业派驻党代表；束缚民企的独立精神，遏制民企的发展规模，扼杀其创造力，

将民企逼向邪路，逼到死角；大量羁押和重判民营企业家，比如孙大午。导致民企倒闭，市场萧条，民不聊生。

反生产力文明生产力文明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激励技术创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畸形分布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失业率之高和大学生就业率之低已经危及经济发展以至于到了国家不敢予以公布的地步。在制度的纵容下，权力对生产资料和土地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掠夺，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是需求不足，供大于需，直接影响民生。政府拖欠公民的医疗报销、医疗救助和低保，乃至降薪，直接打击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经济腐败是人与物质关系的腐败，是权力与金钱关系的腐败，是商业行为的腐败，是人际关系的腐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曾直言不讳地说腐败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润滑剂。由于国家权力垄断和操控着公共资源，导致公共资源的分配成为滋生腐败的源泉。当权力进入商业领域，与资本勾结，形成权力垄断和利益垄断时，必然滋生腐败，曲扭竞争，破坏市场。公权力以权谋私，将权力变现，不择手段地牺牲公共利益，使权力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寻租、贿赂、欺诈、洗钱、偷税、侵吞公款，无恶不作。腐败在阳光下名正言顺地进行。瑞士银行曝光，一百位中共权贵在瑞士银行拥有七万八千亿存款。^①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中国尚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人民币之下，如何解释这期间差距？

中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是畸形的，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滑坡，病入膏肓，风险莫测。中等收入还没达到，就已经提前掉入了陷阱。世界银行乐观估计2022年中国的GDP增长只有2.7%，这个数据已经在暗示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下行灾难。房地产泡沫，制造着大量食利

① 看中国网：〈中国百人存瑞银7.8万亿？官方为“赵家人”洗地大翻车〉。
<https://www.secrechina.com/news/gb/2022/08/20/1014728.html>

者，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冲动；虚拟经济恶性膨胀，打击着实体经济发展。房地产空置烂尾，市场萧条，土地资源供给枯竭，财政收入下滑，金融收缩，信贷危机，人民币持续贬值，供应链外移，中国经济“硬着陆”危在旦夕，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面对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不懂经济的习近平却说他要亲自抓经济了，这令人不寒而栗。

艾伦·格林斯潘在谈到经济增长陷阱时说：“如果陷入了沼泽，那么很有可能是永远都挣扎不出去的”习近平将中国经济带进了沼泽。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以人为目的，不以百姓的福祉为目的，其经济文明的堕落是必然的。

反社会文明

什么是社会文明？社会文明的程度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或者说，只有健康的公民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公民社会界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公民社会，其基本元素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公民人格、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并具有公民的基本素质：精神文明、道德文明、信仰文明和语言文明。在中国，公民社会被扼杀。

公民人格，是一个公民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自我认识。哈耶克说，要把人当作人来尊重。极权中国的“公民们”，任人宰割，没有公民人格，只许有奴才心态。

公民意识，是一个公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的自我认识，对自身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义务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实践，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前提。公民意识的内涵包括独立人格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权力监督意识、公民责任和义务意识，以及法律意识。极权中国的“公民们”，没有公民意识，只有犬儒意识。

公民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首先是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是可以自由言说，自由集会，自由组党，自由参与的权利。极权中国的“公民们”，没有公民权利，因为他们被剥夺参与政治。

公民文化，其内涵是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其外延是公民醒觉、公民自治和公民运动。极权中国弥漫着中共意识形态，窒息着任何健康的文化，尤其是公民文化。

公民素质、精神文明是人类的理性力量，包括对个体尊严的尊重，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守，对正义和公正的执着。

道德文明包括对良知的恪守，对善恶的洞察，对真伪的分辨，对社会底层释放善意，常怀恻隐之心。

信仰文明包括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坚守普世价值；信仰不为强暴所移，不为诱惑所动；尊重他人的信仰。

语言文明作用于思想的传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沟通，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润滑剂。

许志永，丁家喜的“新公民运动”完美地展现了上述公民素质，和平地行使公民权利，理性地推动公民诉求，但遭到极权中国当局残酷镇压。

国民被整体奴化，历史上只有两种制度对国民实行奴化，一是奴隶社会，一是极权社会。极权中国以恐怖统治剥夺国民的尊严和人格，将他们谄媚化和犬儒化，使整体国民完全丧失反抗和抵抗的意志和力量。极权主义摧毁人的本性，企图改造人性，塑造人性，奴化人性，消灭人性，把人还原为动物。希特勒把犹太人当作敌人，列宁把富农当作敌人，毛泽东把地主当作敌人，而习近平则把全社会的人都当作敌人。习治下的极权中国是针对所有人的专制。

社会被整体控制，系指权力对公共和私人社会生活的整体控制能力。威权在顶层固然骄横，但却镇压不住底层的反对声音，国民对待专制的态度，亦可分为反对派、敷衍派和附庸派。但极权主义所展现的国家意志是：所有的反对派必须一概从肉体上被消灭或监禁；所

有的敷衍派必须一概被改造升级为歌德派和颂圣派；所有的附庸派将统统被塑造为谄媚者和告密者。极权政府具有极高的社会整体性动员能力，比如，中央说要抓间谍，全社会便雷厉风行起来相互举报。

科技的发展使得国家有能力建立起制度化的控制体系，从而对社会生活实施整体控制和奴役。国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在监视之中和控制之中，国民被彻底窒息，失去了隐私，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特征。

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充满社会正气，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但是，中国社会是封闭的、畸形的、病态的：

社会正气被嘲弄，社会文明在群体性反智中堕落：道德被权力绑架，有权有势之人作恶时都在拿着道德当幌子，而社会底层的人却在坚守着善良；官员们将扯蛋的事干的很专业，将专业的事干得很扯蛋；政府干正事干得千疮百孔，干坏事干得天衣无缝；过去说你是老实人，是称赞，如今说你是老实人，是骂人；有钱包二奶，却没钱养父母；自己活得苟且而洋洋得意，还要让别人跟着你一起苟且；……

社会公正被颠覆，社会文明在权力的淫威下曲扭，失去理性：拖欠工资者不坐牢，讨薪者要坐牢；强拆他人房屋者不坐牢，捍卫家园者要坐牢；贪污腐败者不坐牢，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要坐牢；制造冤假错案者不坐牢，维权律师要坐牢；碰瓷诈骗者不坐牢，搀扶跌倒老人要坐牢；明星凭脸可挣千万，劳工凭力只挣不足一千……

社会正义被玷污，社会文明在制度性腐败下远离平等，无视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财产分配向权力倾斜，教育机会向金钱倾斜，医疗待遇向地位倾斜，就业机会向后门倾斜，社会充满歧视和偏见，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人权保障。

社会文明在国民性的堕落中堕落。道德滑坡，人性曲扭，精神颓废，社会呈现病态；人民没有幸福感，终日惶惶不安。当勤劳不能致富，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人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也不信任人民；社会充满戾气和匪气，民众变得乖张却非善。社

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不见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精神，但见放纵恶行，苛责善良；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习时代是一个至暗时代，恐惧弥漫于人们的生存空间。在此至暗时代，人们堕落为犬儒者、谄媚者、告密者、霸凌者、平庸者、弱智者、冷情者、猥琐者、软骨者、苟活者；在此至暗时代，人们开始逃离，宁可以难民身份，历经生死考验，也要流向自由之地；在此至暗时刻，公民社会荡然无存。

解构极权政治，解构极权经济，解构封闭社会，在此基础上重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明。

反文化

极权主义价值是反文化的。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或群体特点的社会产品，它展示这个社会群体独特的信仰、价值、伦理、道德、语言、行为规范和习俗，标志着这个社会群体的独特身份。文化提高人类生活方式的内涵和品质，使其更为丰富和充实，比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的发展，使其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当极权主义降临时，它以极其猛烈的方式和粗暴的手段对当下的文化进行改造和摧毁，迫使生活方式和文化产品无一遗漏地浸淫在极权意识形态中。充斥和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是中国特色的党文化，它是极权文化的中国版本，是一种反文化，一种劣质文化。党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极权文化的内涵和规模，促使极权文化从生涩走向成熟。

党文化作为极权文化的当代形式有三个源头：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文化和公有制文化，具有理论和思想指导作用；二是由列宁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苏维埃文化，它是暴力文化、专制文化和阶级灭绝文化的实施阶段，具有示范和鼓励作用；三是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中建立起来的纳粹文化，漠视生命，杀戮生命，具有怂恿和

唆使的作用。三者滋润和灌溉了中共党文化，并把它引向更为暴虐的阶段。

极权主义话语，强行将其单一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深层，全面地无死角地推行官方意识形态并据此操纵国家生活，同时为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套上“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衣，以此对大众媒体进行全面地垄断，对大众思想进行强行地灌输，彻底剥夺国民的独立思想权，言论权和信仰权，将国民彻底愚昧化。

利用极权话语体系控制国家生活。国家话语强调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体现中国话语的主体性，输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党权话语以党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操纵国民思想，宣传“三个代表”，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一切；体制话语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宣言“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弘扬“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极权主义的文化本质就体现在那些夸夸其谈的自信中。

在邓江胡时代，对民间话语的控制曾有所松动。在中国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中，曾涌现出三个使用独立话语体系的社会群体：一是使用喜剧话语的流氓社会，如“毒菜（独裁）”“裆中央（党中央）”“吻脰（稳定）”“我是流氓我怕谁？”；二是使用悲剧话语的维权社会，如“维权意识”“公民权利”“司法公正”；三是使用正剧话语的精英社会，如《零八宪章》。

到了习近平时代，极权帝国收拢了民间话语空间，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突破话语封锁，扫除话语障碍变得十分艰难。人们只好使用“白纸”来表达，无尽的反抗尽在“白纸”之中。

社会文明被语言腐败曲扭得面目全非。语言的腐败体现在官方媒体中，官员的讲话中，体现在无处不在的大标语牌上，体现在孩子们的教科书中，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习近平时代的话语腐败，交替使用恐吓与谎言。语言空洞、贫乏、粗俗、丑陋，充斥与耳的都是些“东升西降”“遥遥领先”“弯道超车”“吓呆了美国人”。

文字狱，体现极权主义话语霸权和文化专制，扼杀一切自由言论和理性批判。不可妄议中央，“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造成全民噤声。大胆敢言者被冠以“思想罪”，并被剥夺生存能力。文字狱必然导向党八股，官话、套话、媚话、不绝于耳。文字狱必然导致文化沙漠，文风、文笔、文体，语言粗俗，文字空洞，文过饰非；不是充满虎狼气，便是充满粉脂气，唯独缺乏美感与正气。文字狱彻底绞杀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老百姓抱怨“过去说谎话需要勇气，现在说实话需要勇气”，“过去说谎前要琢磨一下，怕被别人揭穿；现在说真话前要琢磨一下，怕揭穿了别人。”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话语现状与文明堕落。

极权主义伦理，中国人传统的伦理精神滋润着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然而，随着中国的文化形态被极权主义所摧残，中国人的伦理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无视生命，践踏生命，正是极权主义伦理的体现。大规模的生命杀戮和人格杀戮，把极权统治的稳定看得高于生命的尊严。人作为幸福的主体和道德行为的主体，只有当其自由并被尊重时，才符合伦理。

煽动仇恨，播种仇恨，是中共的革命伦理。中共既是靠煽动仇恨起家的，也是依靠传播仇恨来维护其统治的。播种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宗教仇恨，历史仇恨和国际仇恨。煽动穷人仇恨富人，煽动中国人仇恨西方人，煽动农村人仇恨城里人，煽动无知者仇恨知识分子，煽动子女告发父母，煽动反日、反美情绪，以此转移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中国人生活在仇恨中，不但仇恨别人，而且被别人仇恨。仇恨文化激发人性之恶，窒息民族的灵魂，从而使整个国家浸淫在仇恨中。仇恨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化。

煽动激情，鼓吹献身，虚构理想，是中共操纵和运动群众的伦理。“把青春献给党”“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利用年轻人的青春热血，把人们带入疯狂的失智状态，以便控制他们去完成预先设定的盲目的革命目标。其中个体的价值被埋没了，个体的生存、发展和自

主权被否定了。极权主义伦理蔑视人，把人工具化。

民主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政治行为和政治决策符合道德原则，要求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优先考虑公众利益，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极权中国的政治伦理否定宪政与民主，将权力建立在毫无道德原则、毫无人性基础的伦理之上。以崇高的名义掩饰权力的虚伪和贪婪，以恐怖的手段压制反对的声音，以豪华的词汇为道德溃败和滥权辩护。极权政治无道德制约，无伦理底线，无政治正当性。

极权主义美学，为极权主义作美学包装，为美化极权服务。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极权主义美学将审美法西斯化：张扬暴力美学、权力美学、控制美学。炫耀军国主义，炫耀警察国家，炫耀对人的奴役，炫耀对它民族和国土的征服。

尼采说“权力的意志就是美的意志”，这就是极权美学的全部意义，以最高权力的审美取向主导全社会的审美格局，以“万民仰视”“万民跟随”营造权力的威严和巅峰，营造极权不可挑战不可动摇的绝对地位。颠倒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判断。

当艺术被赋予了政治秉性时，艺术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灭了。极权主义美学将艺术行为政治化，迫使艺术作政治表述。法西斯审美反映在几乎所有的音乐、美术、雕塑、文学、诗歌和影视作品中，刻意构建崇高，宣泄狂热，鼓动献身，煽动仇恨。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从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和欣赏趣味。

一方面，极权主义主宰着美学的话语权，以征服和控制国民为美学出发点；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的绑架下，芸芸众生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发展出面具美学，媚俗美学和犬儒美学，以此丰富着极权主义美学的内涵，却远远地偏离了人道主义。其它如遵命艺术、太监艺术、弄臣艺术、附庸艺术和谎言艺术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极权主义艺术的盛殿，也注定其要成为极权的殉葬品。

当极权主义走向萧条的时候，盛世美学便是一剂兴奋剂。盛世美学向全世界展示“大国崛起”“中国站起来”“中国梦”。讴歌盛世，

粉饰盛世，更像是一剂给与心理暗示的强心针，却不能真正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和灾难。

极权主义宗教，宗教涉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同时也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观念；宗教既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也是个体遵循神示通过修身和禅定从而实现人生的终极追求。但是，极权中国一向把主义当作宗教来传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极权主义的宗教。共产主义图腾伴随着谎言在中华大地大张旗鼓地弥漫着，宗教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极权主义统治需要民众进入盲从状态，进入对权力绝对服从的心理状态。为此极权主义总是处在不断造神的运动中，神化领袖，神化党，制造绝对权威，宣扬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让追随者顶礼膜拜。2023年出笼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明确指定“习近平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制度化。总书记看一眼的杯子立即就能成为圣物。通过个人崇拜和权力崇拜把习近平当作神来供奉，把习近平思想当作宗教，把习近平文选当作圣经，把习近平语录当作圣谕。媒体、报刊、电台、书店、乃至课堂都定于一尊，毫不遗漏地被利用来灌输习的教导。

既然党文化要求独尊本教，必然就要消灭其他宗教。中国地下教会的遭遇，新疆穆斯林被镇压，佛像被砸，香火被断，证明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难有立足之地，佛教界的领袖们则干脆被政府收编，并支付薪金；少林寺成为盈利机构，道观成为淫秽之地。极权中国以“非法”和“邪教”之罪名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个体信仰的权利被践踏，整个国家充满信仰危机。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律师为宗教自由案件辩护而被失踪。

宗教的核心价值是向善，但党文化引导人心向善、向伪、向愚，造成社会伦理的崩溃和堕落。

极权主义思维，极权主义的思维模式拒绝逻辑思维。不仅在教育

中拒绝逻辑思维教育；在媒体中也拒绝逻辑思维表达。逻辑思维是认知思维，是理性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知能力。极权主义拒绝逻辑思维，因为担心谎言被揭穿，担心人们一旦掌握了逻辑思维这一工具，便会增长对事物的真假、美丑和善恶的判断能力，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极权主义的本质。

极权主义思维拒绝思想自由，拒绝善良，拒绝自我认知，拒绝对自己的罪虐反省，因此在罪虐深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没有思想自由，中国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创新大国。

平庸之恶，系指无权力者被极权主义绑架与裹胁，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有权者作恶的行列，盲从、胁从或服从。对有权者实施的极端之恶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参与其中也不知羞耻，不知罪恶。由于洗脑的结果，人们丧失了对恶行的判断力和思考力，甚至把罪恶之举冠以正义之名去执行。这就是平庸之恶。用中国人的话来描述，那就是助纣为虐的恶，帮凶之恶。

绝对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都在造就平庸的人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完全被封闭，被主宰，被监视的社会，生活在一个没有尊严的恐怖环境中，人们不得不拿人格和尊严去交换生存空间，甚至不得不拿他人的自由和尊严去交换自己的生存空间，比如那些恶警，保安，白大褂，红袖章。权力特别善于跳动群众斗群众。

平庸之恶是极权制度压迫下产生的群体之恶。平庸之恶几乎成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常态。极权主义需要的就一批无自我权利意识，因而便于对其进行思想控制的盲从群体；极端之恶之所以久盛不衰，乃是因为有平庸之恶给予民粹主义支撑之故。

平庸之恶在道德层面的特征是：无基本良知、无道德底线、无罪恶感；颠倒认知，颠倒正义与谬误。平庸之恶在法律层面的特征是：胁从性和弱罪性。胁从的恶，弱罪的恶，构成平庸的恶。

一群五毛，来自“民间”的鸡鸣狗盗之徒，指鹿为马，造谣惑众，

扰乱舆论，颠倒黑白，陷害忠良，换口嗟来之食。一群小粉红，使用网络暴力，以民粹的方式制造爱国主义恐怖，以爱国主义杀人。所谓“无良学者”，乃是一批皇上要撒尿立马就端尿盆的现代太监。公务员中不乏平庸之辈，一心想从权力的龙体上摘一片龙鳞以装饰自己炫耀自己。对上级定是阿谀逢迎；对百姓定是如虎如狼，靠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中饱私囊。他们腐败、平庸、冷血，势利，却最擅于使恶。

米兰昆德拉说，知识分子谄媚乃国之不幸。知识分子不说真话，缺乏人格，失却风骨，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充满正气，而不得不在平庸之恶中沉沦。

从众，是获得安全感的最佳出路。从恶，乃因难以独善其身。把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放在恶人群里，他很快就会在获得归属感的过程中失去自我，失去理性，接着也失去了良心，并迅速被盲从、偏执和狂热所驱使。权力作恶，他们跟着一起作恶；权力撒谎，他们跟着一起撒谎；权力泯灭人性，他们跟着一起泯灭人性；权力煽动民族主义，他们跟着扮演战狼；……平庸为罪恶提供土壤和温床；有权者作大恶，极端之恶；无权者作小恶，平庸之恶。

在极权主义体系里，人们难有挑战权力的可能，因为挑战的成本太大，要以生存空间，生活收入，工作机会，家庭安逸，个人名誉作为代价，甚至要付出生命。所以只能选择服从或盲从，选择平庸。不服从的后果是严重的，严重到不能承受。

平庸之恶的群体性、普遍性、胁从性和弱罪性成为极权主义制度下独有的文化风景。平庸之恶导致审美退化，道德退化，思想退化和文明退化，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退化。平庸之恶不除，中国人种都将退化。

党文化是反文化，是反人类的文化。文化只有当其符合社会族群的良知时才是优质的文化，党文化显然不是，因为它违背基本的社会良知。

解构极权主义话语，解构极权主义伦理，解构极权主义审美，解

构极权主义信仰和价值，是反对极权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

反人道

什么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哲学，张扬人性的自由和个体的尊重。人道主义关注个体命运，是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给予最大的关注的思想体系，是以人为最终目的的价值理想。人道主义关注的是全人类的福祉，全人类的命运。

人道主义站在人类历史和发展的大视野下，不仅致力于制止灾难，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且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符合人道主义的政府。人道主义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的基石。

人类生活方式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而越来越趋于人性化，越来越丰富多彩；然而，极权主义之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却越来越监狱化、囚徒化、病态化、窒息化。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以国家机器为武器，通过实施暴力，置本国公民于恐怖之中。从大饥荒，大屠杀，红色恐怖，到政治杀戮，都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罄竹难书，那是一部部血泪史：

大饥荒，发生于 1959~1961 年间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道灾难。其主要成因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一系列违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反人道的愚蠢政策所致，比如人民公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炼钢铁，除四害、统购统销，计划经济、浮夸风，这些制度性的社会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生产力，破坏了供需关系和分配。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饥饿死亡人数将近 3000 万，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秘密报告认为是 4600 万，中央党校余习广研究结果为 5500 万。美国独立学者丁抒认为至少是 4000 万。因此将大饥荒饿死人数定在 3000~5000 万

之间（取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较为可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百倍以上。

此外，各地均发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肃、山东、青海、贵州为甚。这是一出出饿殍遍地，易子相食，饥寒交迫的人间惨剧，它由中共一系列反人道的政策所造成。

中共的“特供体制”在大饥荒时代同时出笼，1960年，中共决定对向其高级干部提供食品特殊供应，鱼、肉、烟、酒、蛋、豆、糖，一样不缺。它夺的是千百万农民的救命粮。历史学家宋永毅先生指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大屠杀：故意地杀害不具备防卫能力的人类的行为，称之为屠杀；较为严重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屠杀行为，称之为大屠杀。大屠杀是国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以下这些类别：阶级灭绝，种族灭绝，宗教灭绝，思想灭绝，政治灭绝，和民众灭绝。

恐怖统治：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极权帝国以国家机器为武器，通过实施暴力，置本国公民于恐怖之中，这一行为又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对政治反对派实行的政治清洗和镇压，而且是对全体公民实施的政治震慑。

红色恐怖：特指共产极权下的大规模镇压、处决和清洗政敌的行为。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实施的大屠杀，都是以政治清洗为目的的红色恐怖行为。

阶级灭绝：清除和杀戮阶级异己分子，或整体灭绝某一社会阶级，比如：土地改革运动，旨在消灭中国农村地主和乡绅阶级，摧毁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由于运动的暴力和血腥方式，将近2000万人受到打击。据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有200万。而其他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有470万（日军南京大屠杀的15倍）。

三反五反运动，又称“打老虎运动”，是针对工商界的整肃运动，反击资本家对党的“猖狂进攻”，许多资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杀，

或被处决，或被折磨致死。

种族灭绝：清除和杀戮一个种族、族群、或国族；

藏区骚乱，军事镇压造成 8.7 万人死亡。

“内人党”事件，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的政治清洗，近百万人受到牵连，罹难人数约 2~10 万，多为蒙古族。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

新疆再教育营，关押着将近一百万人，对维吾尔民族进行语言和文化清洗，破坏民族信仰，强制将孩童与父母分离，强迫实施绝育，被联合国人权组织指控为“种族灭绝”和“人口灭绝”。

极权帝国走向了种族帝国主义。

宗教灭绝：清除和杀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仰徒。

对藏人，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同时也是宗教灭绝，即灭绝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拆教堂，封禁地下教会，抓捕传教士，是为了在中国灭绝基督教；砸庙宇，砸道观，强制和尚和尼姑学习习近平著作，将党支部建立在佛寺，灭绝了佛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作为一种新宗教在中华大地传播。

政治灭绝：清除和杀戮政治异见者和政治反对派；中共为巩固政权，肃清敌对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充满着迫害、监禁和杀戮，比如：

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报告显示：共抓捕了 260 万人，镇压了 157.6 万人，处决了 87.3 万人；而民间学者估计远高于此。

肃反运动，全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有超过 10 万人被俘，5.3 万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据官方数据显示，有 55 万人遭受迫害，他们被戴上“反党”的帽子，或被改造和关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杀，或被处决。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整肃扩大化，几百万人遭到

迫害，整死了大约 10 万人。

政治清洗，近有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清洗，前总理李克强“被心肌梗死”，还有什么周永康、薄熙来、孙立军等被清洗，远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诸如彭德怀和超过 300 万敢于批评“三面红旗”运动的党员干部遭到批判，导致大饥荒的进一步深化，更多的人被饿死。

不论他们究竟是政敌，是阴谋家，还是改革者，一旦对在位的权力构成威胁，便将其收监或迫害至死。

民众灭绝(整体灭绝)：一个国家对国民进行的广泛的灭绝行为，是针对民众整体的杀戮。

四清运动，一共肃整了 532 万人，其中 7.8 万人被整死，逼死。

文化大革命，大约一亿人受到迫害，至少 172 万至 2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各地的大屠杀，较为严重的有：

“广西文革大屠杀”，不仅把专政对象杀死，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罹难人数达 10~15 万；

“广东文革大屠杀”，包括阳江大屠杀和儋县大屠杀，罹难人数约 4600；

“湖南文革大屠杀”，包括道县大屠杀和邵阳县大屠杀，罹难人数约 1 万多；

“江西文革大屠杀”，包括发生在瑞金、兴国和于都县的大屠杀，罹难人数约 1000 人；

“云南文革大屠杀”，包括滇西挺进纵队案、赵健民特务案和沙甸事件，罹难人数约 8800 人；

“四川文革大屠杀”，包括万州和涪陵事件，罹难人数约 693 人。

文化大革命集阶级灭绝、种族灭绝、政治灭绝、思想灭绝、宗教灭绝和民众灭绝之大成。

六四大屠杀，1989 年 6 月 4 日发生在北京由中国政府调动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使用坦克和机枪扫射的行为完全符合

上述关于“大屠杀”的定义，尤其是“民众灭绝”的定义。六四是一场明火执仗地大规模杀戮行为，中共把枪口直接对准了人民，这是中国政府动用国家机器犯下的反人类罪。

这些记录在案的六四伤亡者们所遭受到的杀戮惨不忍睹，比如：赖安民，半边脸被炸飞；方政，双腿被坦克碾压；田道民，被坦克直接碾死；南化通，胸腔被炸烂；龚纪芳，女，遭受毒瓦斯攻击后昏迷，肺部糜烂而亡；罗维，腹部中两弹，一为达姆弹，在腹腔炸开，伤及肝、肾、胆、胃和消化道，死于肾衰竭；……苍天有眼，也会为之哭泣。

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屠杀事件的频度是惊人的，这些血腥暴力具有历史的惯性，每隔三五年就要再来一次。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预谋的国家机器犯罪行为和国家公权犯罪行为，大规模肃整、抓捕、关监和屠杀民众，行为之野蛮、之残暴、之毫无人性，举世罕见。

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正是这个制度提供了杀人机器，提供了积极参与和实施屠杀的军人、警察、国安，特务、提供了监狱，这些屠杀当属于制度性的大屠杀。

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进行的。正是这些名义所形成的巨大的舆论场，推动着屠杀向前。因此这些屠杀又可谓之以意识形态杀人的大屠杀。

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都带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全部都是（1）政府行为，国家公器犯罪；（2）和平时期，动用现役军人和机枪坦克；（3）全面杀戮，涵盖几乎所有的人类灭绝类别：阶级杀戮、种族杀戮、宗教杀戮、政治杀戮和整体民众杀戮；（4）被杀对象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这些特点足以构成大屠杀罪和反人类罪，足以将中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

新冠疫情，这是发生于二十一世纪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人道灾难。

从新冠疫情发生的地缘看，沿着扩散轨迹逆向溯源，可以看到疫情初期，扩散到全世界的新冠均源自中国；从疫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疫情也是首先发生在中国武汉。至于病毒究竟是源于武汉海鲜市场，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新冠病毒源自中国。中国政府对这样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负有责任，是中共漠视生命的本质使然。

由于中共隐瞒了病毒的发源，传播和扩散，据《柳叶刀》刊文估计，造成全世界大约 1800 万人死亡（中国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死亡估计是 1490 万。防疫科学被政治利益所裹挟，是导致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新冠病毒的蔓延，中共难辞其咎。中共对那些死去的亡灵至少负有过失杀人罪，甚至故意杀人罪。各国政治家中认为极权中国将疫情向全世界传播的罪恶已构成战争行为的不乏其人。

动态清零，是中共控制疫情的对内政策，其在全国酿成的人道灾难触目惊心。私人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践踏得如此彻底。疫情远远没有清零，腐败没有清零，贪婪没有清零，权力垄断没有清零；但人心被彻底清零了，人的诉求、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被清零了，甚至人的生命也跟着被清零了，整个社会弥漫着法西斯统治的恐怖。

法轮功，是受到中共蹂躏最深的群体之一。在押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毒打、电击、体罚、窒息、烫伤等等，强摘活体器官，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权贵提供活体，被迫害至死者大约在 4000 人左右。

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无论是在哲学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极权主义都是人道主义的敌人。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拿起人道主义这一武器十分必要。

一个反人道的政府，不具任何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

解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

反人权

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自然属性，它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人生而自由，生而有尊严，人生而具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人权还包括反对酷刑，反对迫害，反对非人道待遇的权利。极权主义对人权的剥夺，通过肉体杀戮，思想杀戮，人格杀戮，人性杀戮来实现，其本质是把人还原为动物。

思想杀戮，即脑控，这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脑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实施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和控脑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只有对全体人民实行彻底脑控之后，极权主义才可能进行思想操纵、信仰操纵、价值操纵、认知操纵、话语操纵、审美操纵和教育操纵，从而全面控制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脑控，违反人类伦理。奴隶制实行人身奴役，极权制度实行人脑奴役。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是极权的灾难，极权主义的生存法则要求必须对全体民众实行愚民政策，实行反智主义，实行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的全面脑控，否则极权主义无法生存。全民脑控彻底关闭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门，使人们生活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众与极权博弈的最前沿就是脑控与反脑控的斗争。

人格杀戮，人格诋毁，剥夺个体尊严、打造奴性人格，违反基本人道。极权社会的人格杀戮具有规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征，它指向社会群体。对公民的心里人格、社会人格和政治人格实行普遍的摧毁，最终剥夺公民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观。国家的精英阶层被犬儒，精神栋梁被犬儒，民主价值的守护者被彻底清场。从被迫做奴隶，到自愿做奴隶，再到沦为奴隶而不自知；从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杀又可辱，将人格交给党去任意蹂躏，由此大规模地完成了中国人之人格的彻底驯化，人们不得不出卖人格去换取生存权空间，从而成就了极权社会的奴化统治。国人的格解体，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识的消

沉，乃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危机，也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人性杀戮，即对人性的奴化。最大的人道灾难莫过于对人性的奴化。中共对人的行为模式的直接控制，对人的思想进行阉割，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令国民沉寂于麻木、冷漠、失语、谄媚、犬儒、谎言和恐惧之中。牺牲每个人的利益，服从党所认定的历史法则和道德法则。不仅仅是对人的专制，不仅仅是苦难，也不仅仅是生命的杀戮，而是要改造人这个物种，摧毁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那些特性：思想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和自由的本性，最终消灭了人性，从而把人还原为动物。这才是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人权灾难。人一旦失去辨别善恶的能力，失去内心的道德律令的召唤，个体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无力拒绝平庸。

酷刑，是肉体杀戮的一部分，是指政府为了惩罚个体而蓄意实施的令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和痛苦的行为。酷刑的目的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和法律人格。极权中国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恐怖统治，是绞肉机。对国民，尤其是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囚禁、斗争、折磨、酷刑、以及种种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死亡威胁和杀戮恐吓，来迫使其就范。对维权律师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对政治异见者的打压，手段都极其残忍。实施酷刑是政府犯罪行为。极权中国对国民实施酷刑有以下四个特点：

夺命：以死刑和枪决消灭生命与肉体，比如镇压反革命，强摘法轮功活体器官等，杀人无数。

封喉：扼杀言论自由，比如张志新在临刑前被割喉，比如反右运动，比如建立防火墙，都属于禁声运动，彻底剥夺了公民的话语权。

挖心：消灭宗教，消灭信仰，灵魂深处闹革命，对人进行公开的羞辱，煽动群众自相残杀，陷国民于恐惧之中。

残脑：摧残人性，阉割思想，展开声势浩大的思想奴化运动，陷国民于窒息之中。

死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大约有 4000~5000 万，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杀的 140~160 倍。除部分死于饥饿外，大多数被肃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计划生育，操纵国民生育，实施生命杀戮。生育是人类繁衍的自然行为。生育权是私权，也是基本人权。中共生育政策五十年来的跌宕起伏，为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

中国近日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公共行为，公共言论和公共场合下的衣着制定惩罚条令，包括“伤害感情罪”，这是一部荒唐的违反人权的恶法。

解构极权主义统治。

反人性

人之初，性本善。固然，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的思考，对人的道德，伦理，情感的认识和表达，受到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但是，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改造，把原本善良，诚实，敦厚，智慧的人改造成卑劣，欺凌，狡诈，顺从，愚昧之人，改造成本性全非的人类。极权主义挖掘人性之恶，迫使人们以卑劣的手段，换取生存权。

谄媚主义，以奴才的心态、卑贱的奉承、肉麻的语言迎合权力。荀子《修身篇》曰：“谄谀我者，吾贼也”。阿谀奉承者，必是谄上骄下的势利小人，害我之贼人也。墨子《亲士篇》曰：“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只要有阿谀奉承的小人在一侧，忠义之士的善良建议必受到阻塞，此时的国家就危险了。传统的谄媚，是个体表现，个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揣摩权力的意图，讨好权力的喜好，迎合权力的心意。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则是群体性规模化的表现，因为整体感到不安全，生命和财产都受到来自权力的威胁，因而谄媚便成了这个群体的整体行为，诸如“习大大，彭嬷嬷”的呼喊。就连政治局常委，都不得不迎合圣意，附炎附势，曲意逢迎，“皇帝新衣”，说

着令人作呕的媚语。极权主义之下的政治氛围，迫使人们阿谀谄媚，从而使得权力更加骄纵，而民风坏矣，人性变得更为懦弱与黑暗。

犬儒主义，顾名思义，如狗一般活着的书儒，谓之犬儒。现代犬儒有两类，一类是冷漠型，处于强烈的政治绝望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对现实冷漠，对生活禁欲，对未来不作为，对是非善恶无动于衷，逆来顺受，消极对待；躲在避风港里，等待他人去牺牲，然后无耻地分享果实；用现代流行语描绘，即“躺平”。另一类是帮凶型，背靠大树好乘凉，不论极权政府干什么坏事，都惟命是从，积极配合，盲目跟随，俯首帖耳，“党叫干啥，就干啥”，绝不挑战权威。指鹿为马，指鼠为鸭，是检验这类犬儒是否价真货实的试剂。犬儒们很是满足自己的地位，满满的幸福感，他们深陷这样的思维模式：既然犬儒是权力所希望的状态，那么犬儒便是最安全的。犬儒们把原本在暴政下放弃自尊，放弃人格，放弃批判的被迫行为，内化为自觉和主动的行为，自责，自虐，自残，自我否定。人性如此曲扭是社会的悲哀。

在反抗极权主义的队伍中，看不到犬儒的影子。因为犬儒是权力的共犯。

反智主义，以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运动，打击知识分子的傲骨，迫使他们臣服，迫使他们噤声。反智主义的内涵有二：一，敌视并反对知识；二，敌视并反对掌握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反智主义的核心主题就是去精英化。由于这些人往往掌握着他们所在领域的思想优势和代表着那个领域的思想特质，而封住这些人的嘴，把这些人变成白痴对于共产党政权十分重要。反智主义鄙视知识，反对科学，否定教育。反智主义远离人的正常思维，远离理性，远离常识，远离逻辑和价值判断，甚至远离伦理。反右以及文革则是中共掀起的现代版的反智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知识被批得体无完肤，被打得遍体鳞伤。即便是大知识分子，诸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冯雪峰等也都人格扫尽，尊严全无，不得不向党“投降”。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展示的纲领、口号和指导思想都具有

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比如咒骂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掌握知识越多越反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炼钢；忽而退耕还林，忽而退林还耕；等等。这些都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瞎折腾，阻碍科学发展和 社会进步，摧残创造力和想象力，降低公共教育质量，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整体崩溃。

愚民政策和反智主义双管齐下，促使社会愚昧逐步具有了普遍性和全民性的规模。

谎言文化，摧毁着人心深处的善良和诚实。谎言与恐怖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两手绝活，以谎言操纵整个社会，使用舆论导向控制人们的思维，用美丽的谎言，掩饰残酷的社会真相；编造美丽的神话，以欺骗民众。

纳粹分子戈培尔的谎言理论，为中共所垂青：“如果要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谎撒的越大，越有可信的力量”，“谎言重复一千遍，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作真理”。中共不仅全盘继承而且发展了戈培尔的谎言理论，对于谎言“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入心入脑入魂”；中共努力用谎言塑造人，用谎言包装社会，令全社会都浸淫在谎言中。社会上充斥着党媒制造的谎话、假话、瞎话、狂言，妄语和空话。

他们明明知道人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还要继续撒谎，这不仅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更是他们坚信，只要他们不断重复，这个谎言就一定能植入人们的大脑。

党文化对谎言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将谎言物化，即造假。中共不仅精神造假，而且物质造假；不仅文字造假，新闻造假，而且数据造假，科技造假，产品造假，工程造假，文艺造假，财务造假，历史造假。一切皆可造假，一切皆可山寨。利用文艺造假更是中共一大发明，什么战狼剧、脑残剧、雷人剧、抗日神剧，胡编乱造，低俗谄媚。

厚黑文化，曾几何时，厚黑学流行于市，不仅仅在市民阶层和流

氓市侩中盛行，而且成为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成为官员的为官之道。李宗吾写厚黑学，本无可苛责；但厚黑学一旦进入当下极权主义语境和体制环境，其黑则更黑，其厚则更厚。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对厚黑学趋之若鹜。人们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游走，不知廉耻为何物。媒体甚至将其作为成功学来吹捧。厚黑学教你如何求官，如何做官，如何求生，如何变得老奸巨猾，如何更有城府，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厚黑学利用人性弱点，伤害社会伦理，败坏社会风气。由厚黑学激发出来的恶，促使中国官场变得更为厚颜无耻。

告密文化，激励着犬儒和市侩们内心深处最卑劣的品质和求生冲动。制度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并把告密法律化，鼓励民间举报。告密的制度性因素远远超出了伦理因素和道德因素。虽然子女举报父母，有违伦理；学生告密师长，有违道德，但由于“政治正确”从而获得了“正当性”。因而“恶人先告状”，“打小报告”，蔚然成风，朝廷中多了酷吏，民间多了冤魂。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间达到鼎盛。如此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谊和亲情。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厮杀的社会环境和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告密文化摧毁社会伦理和社会结构。

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些无法接近权力中心地带的人，不得不把自己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达此目标，需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极端自私，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没有信仰，没有担当，没有社会责任感，更没有大关怀和大悲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实用主义者；他们善于伪装成体制的忠实拥护者，也善于表达忠诚。在感情与理性的撕扯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自己也知道这是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之下的一种挣扎，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只能在精致的利己中变得麻木不仁，直至躺平。

极权主义曲扭人性，乃至改变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综上所述，极权中国反文明、反文化、反人道、反人权和反人性，足以构成反人类罪。这制度没有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理由。解构它！

极权主义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极权主义全球化战略的实质是权力全球化，不可小觑极权中国的全球野心。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从来就有“天下帝国”的理想。因此当中国人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现代语汇的时候，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它“天下帝国”的内涵。当极权主义中国要充当全球化引领者时，它真正的政治含义，不是出自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家行为，不会遵循现代国际标准和现代秩序，它只是一个帝国王朝的狂妄，一个幻想着纳天下于一疆的极权主义幻想。

极权中国追求全球化战略的意志离不开其对全球权力的窥视和野心。威权主义只专注于本国疆域的统治权，但极权主义却企图将权力向外扩张，向本国疆域之外投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

中国扬言，全球化的上半场已经以失败告终，全球化的下半场，将由中国主导。中国扬言，只有中国才能引领全球化走出困境，中国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咄咄逼人地展示这个极权帝国志在必夺全球化领导权的野心。韩正在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上再次霸气十足地抛出了《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扬言“要为人类的前途担当”，正是这一写照。

中国全球化方案并非是一纸空文，而是付诸于一系列具体的战略实施，它在全球的布局 and 经营，进行红色渗透，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经济全球化战略，包括贸易、货币、金融以及服务行业全球化战略，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中国经济的动脉向全世界延伸，通过跨国公司扩大海外市场规模、扩大海外投资、扩大海外运营和绩效，扩大海外资源的配置和占有，创建国际品牌。中国利用制造大国的优势，把握全世界经济的供应链，让“中国制造”覆盖全世界。

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新殖民主义，以便掠夺他国资源和能源，占有其产业和创新，以及通过制造债务危机来实现对所在国货币和金融

的控制。他们在海外修建公路、铁路、港口、商品集结地；他们在海外设立银行和跨国公司，抢占新兴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制定权。

军事全球化战略，中国的海外海军基地已经建成和将要建成的至少已有八个，直接参与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外基础建设项目超过100个以上。中国的数字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战略，目的在于，引领全球数字治理格局，对全球信息进行操纵，抢占信息战制高点。中国在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中都支持发动战争的一方，这表明中国自己正在准备发动战争。中国最新发布的中国地图，再次展现了地缘扩张主义。

权力全球化战略极权主义全球化追求的是国际权力，以篡夺和控制国际权力的多少为指标，以其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的大小多少来判断其控制全球化的程度，以其左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的份量来评估其占有全球化份额的期望值，以中共的意识形态作为发言和起早文件的话语体系，抢占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

在国际上，中国与极权国家、独裁国家、威权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结盟，在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中与北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站在一起，形成“邪恶国家共同体”，集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成，扬言要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中共走的每一步棋都体现着野蛮和愚昧对世界文明的挑衅，都是在与世界文明对峙。

中国霸凌地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企图推翻并取而代之现有的世界秩序。由于不遵守WTO的规则，WTO已经快被中共玩死了；如今要想加入CPTPP，没门儿，没人愿意跟你玩了，一边呆着去。这叫去中国全球化。

西方曾期待中国的国家转型，那是幼稚的。若以为“一路一带”已经成为烂尾工程，这高兴得有点早；别小看“金砖五国”的扩容，它展示的是与G7以及G20抗衡的姿态。“77国集团+中国”体现着中国理念在南南合作深入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势力虽然正在被赶出

欧洲，但已经进入拉美和南美，进入美国的后院；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已经进入高校，进入侨界，进入高科技公司，甚至进入美国议会。认为中美关系是竞争关系，那就错了，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大盗，一个窃贼，两国之间怎么可能有平等的竞争？

习近平向全世界正式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白皮书，一份正式的中国方案，该方案固然浓妆艳抹，华而不实，但你能感受到中国来势汹汹，虽说它已是苟延残喘，却依然能将世界搅得极度不安宁。

综上所述，中国全球化方案，是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方案，世界需要警惕不被带入中国陷阱。在国际事务中必须有这样的魄力，如果要造福全人类，那么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一切国际事务中去极权主义全球化。

解构“一带一路”，解构极权主义之“命运共同体”。

结束语

归根结底，极权中国的政权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具有习近平特色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进入晚期，极权帝国正在走向终结。虽然沙暴还在肆虐，但已经是尾声。

彭立发的大智大勇，白纸运动所展示的民智勃发，都说明思想自由的春潮在涌动，民众大彻大悟的一天正在到来。地下的火在升腾，只要找到出口，就会喷薄而出。

威权主义尚存通过改革走向民主的一线希望，只要民主的载体和民主的路径选择符合正义；但是，极权主义不存在这种希望，极权主义完全不具有丝毫民主的基因。中国所经历的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然后又返回极权主义的迂回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对极权中国而言，改良的道路已被中共堵死，改革的道路也已被中共堵死，极权中国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一条道走到黑。中国人不该

对极权主义抱有任何改邪归正的奢望，必须彻底铲除极权主义，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曙光。第三帝国的灭亡是彻底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是彻底的，在中国铲除极权主义也应该是彻底的，而不应该是修修补补或者是换汤不换药的。相信人民会选择和平方式，和平道路，但极权者未必。我们既不拒绝历史的启示，也不沉溺于历史的经验，我们将根据现实的要求，沿着思想和理性指引的方向，积极解构极权主义制度，兢兢业业，披肝沥胆，艰苦卓绝地探索着前进。

民主是众人的事，只有众志成城，前仆后继，才能成功；自由不是天上的馅饼，不靠上天赐予，被奴役的人们，必须站起来，挺直脊梁，向极权主义说不。有人幻想中共党内再出一个赵紫阳引领改革之大业，有人幻想极权中国会像沙器一般轰然倒塌，再美好的愿望，毕竟仅仅是愿望，中国民主运动需要的是行动，不是等待，哪怕是长期的行动。

不论风云如何变幻，政治反对派行动起来，全体中国人行动起来，积极地，全面地解构极权主义制度！

解构！解构！解构！